

新文学考据举隅

朱金顺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姚旗

新文学考据举隅

著者：朱金顺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发行者：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者：一二〇一工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插页：4

字数：23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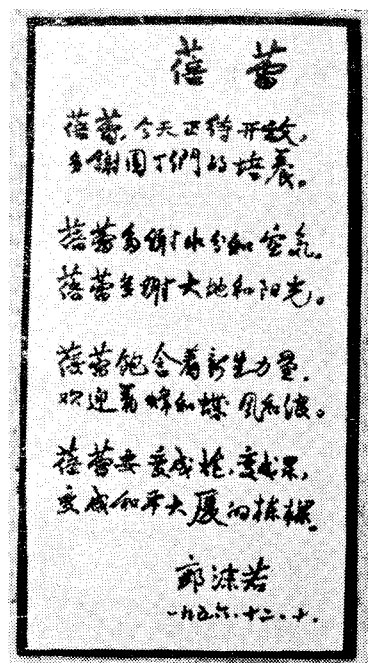
版次：1990年12月第一版 199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7—5034—0263—6/C·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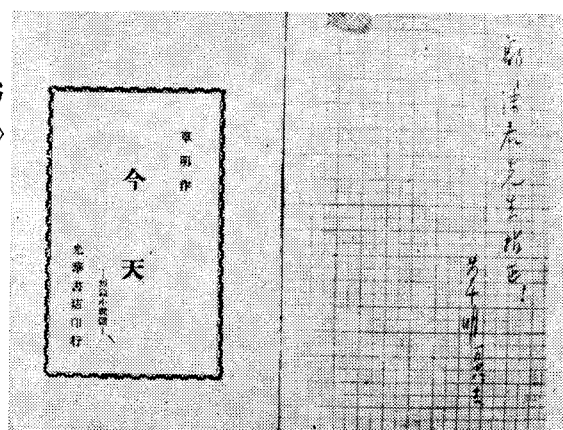
印数：1——1200册 定价：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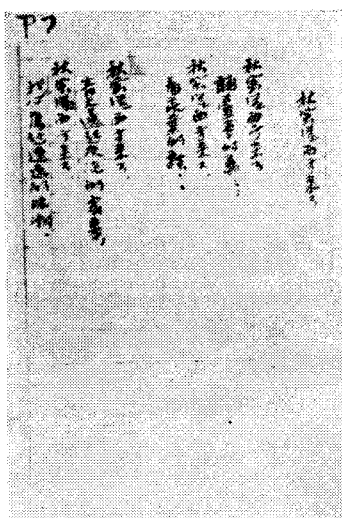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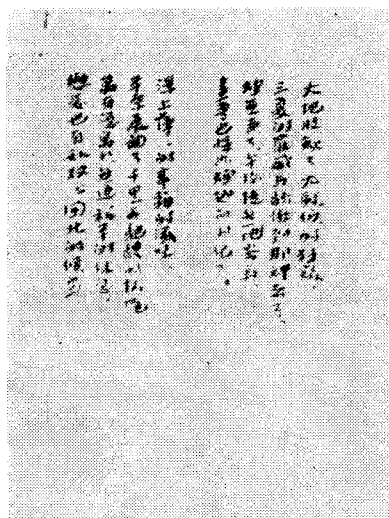


文学研究会成立会摄影(摄于1921年1月4日，原件现藏中国现代文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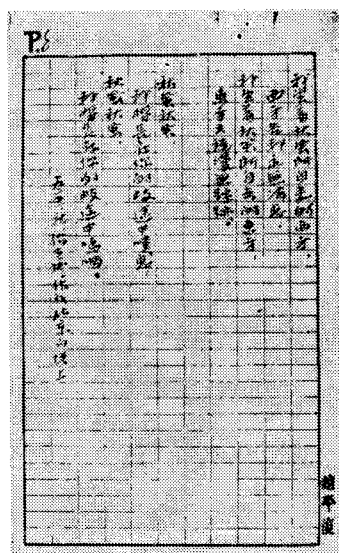


草明著《今天》的书影及郭沫若《蓓蕾》诗手迹





柔石《秋风从西方来了》一诗手迹
(原件分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北京
鲁迅博物馆和北京图书馆)



朱自清《春》的第一次发表文字
(原文收在《初中国文读本》第1册，中华书局1933年7月初版)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

名字也杂，颜色也杂，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着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与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儿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在乡下，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他们草蓑，穿着绿蓑，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筋骨，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儿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腿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朱自清

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他们草蓑，穿着绿蓑，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筋骨，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儿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腿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朱自清

自序

这里收集起来的将近五十篇文章，是我十多年来发表的文字的一部分。大致说，总不出新文学考据、讲疏这个范围。这里缺少系统的理论阐述，多是具体史料的爬梳、考辨和诠释，所以就称之为新文学考据举隅。

考据学，这在我国是一门很古老的学问。从汉儒解经算起，经过宋、明至清朝而达到鼎盛，被称做绝学。乾嘉时代的朴学家，在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诸方面，以至文字、音韵、训诂等等，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了全套的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考据之学。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的考据学占有重要地位，做出了突出贡献，至今被人们所宝贵，称之为汉学。这些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也一直被国内学术界继承和使用，我们在整理、研究古代文化典籍时，广泛使用传统的考据方法，而且有所改革和创新。这也说明，考据学具有科学精神，它是有生命力的！

从1917年中国新文学发生，至今已超过了七十年。如果按目前习惯的分期，用共和国成立界定，那也有三十二年。做为特定的、曾经产生过许多大作家的这段新文学历史，目前已形成了专科研究，而且日趋全面、成熟和深入。研究工作大量借鉴、引进了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我们的模式和法门，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方法。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史料之学日益被重视，成为整个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在这个领域中，更多继承了考据学方法，并有所发展和创新。正如王瑶先生所说：“这些著作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考据学的研究方法，但又并没有轻视理论指导

的倾向”。(《鲁迅年谱稿·序》，蒙树宏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认真的研究工作，总离不开考据学，史料研究更是如此。这也再次证明了考据学的科学性和它的生命力！

十多年来，自己教学和研究的内容之一，便是新文学史料学。写这长长短短的文字之外，还为大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了新文学史料学课，出版的讲义是《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这些大都是微观研究，没有太多的宏伟理论；但我以为，学术的大厦，是离不开具体而微的一木一石的。我尝试、借鉴考据学的方法，来写这些文字，史料的爬梳，琐细的考订，版本的记述，目录的编制，都是举例性的。对新文学史料学有兴趣的青年朋友，如果能把这“举隅”和前边说的那本“引论”放在一起翻阅，也许能获得一些常识，增加一点兴味。可惜那本小书，市场上早已售完，而出版者目前也不打算再版了。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考据学是硬科学，它要求证据确凿，靠事实立论。由于个人学识、见闻所限，文章中失实、欠妥之处，恐怕难免，欢迎同行们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说几句有关编辑工作的话。这些文章在发表的当时，都有它的重点和角度，现在放在一起，杂乱而缺少系统。厘为四组，仅仅是大体的归类；各立名目，只是近似而已。通看全书，虽然没有观点上的相悖，使用的例子，却有重复之处；但今天已难以改换和删除了。这次辑印，有两篇文章进行了修改：在《关于鲁迅讲演的几点考证》中，原有一处失误，经李伟江同志指出后，这里修改了；在《张天翼著作目录》中，原有一些遗漏和错误，经胡星亮同志补正后，这里订正了。于此说明，并致谢忱！其他各篇，依原样排印，以保持发表时的面貌，仅在必要的地方，加了一点注释。这将近五十篇文章，曾陆续在国内报刊上发表，就中自然有着编辑同志们的辛勤劳动，现将发表时的刊名和时间，缀于篇末，既表示对于编辑工作的感谢，也便于读者翻检查对。目前的出版界，遇到了一些困难，特别是学术性著作，往往难于

出版发行。我这讲考据的冷僻书，大约不会为多数读者所留心。
现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愿意出版，热心的朋友为它奔忙，我自是十分感激的。临了，借此向诸位为它出版而尽过力的朋友们致谢！

1990年秋日于北京师范大学西北角之寓中

目 次

钩 沉 与 正 误

介绍“文学研究会成立会摄影”.....	(1)
一篇鲁迅佚文的题目.....	(4)
关于《“破坏与建设是一不是二”?》.....	(6)
《萧伯纳在上海》广告应为鲁迅所作.....	(10)
郭沫若先生评《今天》.....	(14)
郭沫若的一首佚诗《蓓蕾》.....	(17)
《秋风从西方来了》补遗.....	(19)
从胡也频的一个笔名谈起.....	(22)
关于鲁迅讲演的几点考证.....	(24)
有关《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意测和考证.....	(30)
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的考索.....	(33)
鲁迅先生与“文艺连丛”.....	(35)
鲁迅与龚宝铨.....	(38)
略说龚宝铨先生的事迹及其他.....	(43)
有关鲁迅先生去大夏大学演讲的考证.....	(49)
关于鲁迅两则短文的标题.....	(53)
关于《鲁迅致许广平书简》的一条注释.....	(56)
鲁迅作品的两处刊误.....	(60)
也谈康大叔不是“黑的人”.....	(62)
考据拾零.....	(64)
举例贵在实事求是.....	(69)
《新鼓词》的作者恐非老舍.....	(70)

《背影》的写作年代及其他·····	(71)
关于《黎明的通知》的写作时间·····	(73)

版本和目录

《骆驼祥子》版本初探·····	(75)
《哀范君三章》字句辨正·····	(88)
关于鲁迅《哀范君三章》的跋·····	(97)
关于《春》的版本·····	(99)
《苦闷的象征》的两种译本·····	(104)
说《〈冬夜〉〈草儿〉评论》·····	(108)
两册《杂拌儿》·····	(111)
冯至的《十四行集》·····	(113)
关于冯雪峰编《郁达夫著作编目》·····	(116)
北方“左联”领导下的一个小刊物《令丁》·····	(118)
〔附〕《令丁》月刊目录·····	(121)
张天翼著作目录·····	(123)
何其芳作品集目录·····	(131)

讲疏之什

“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及其发展·····	(140)
“五四”时期的胡适·····	(152)
《阿Q正传》的早期评论及其他·····	(169)
语丝社述略·····	(177)
莽原社、未名社述考·····	(201)
殷夫《孩儿塔》中的爱情诗·····	(227)

史料学杂谈

建立鲁迅著译版本学刍议·····	(244)
新版《鲁迅全集》校勘三题·····	(251)

资料丰富、考订细密的书·····	(258)
《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读后摭谈·····	(264)
试说新文学研究与朴学之关系·····	(270)
关于建设新文学史科学的认识和设想·····	(286)

钩沉与正误

介绍“文学研究会成立会摄影”^①

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会纪事”中，有这样的记载：“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本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成立大会，到会者二十一人。……选举毕，提前摄影。摄影后，讨论本会进行方法，……”（《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这里提到的“成立会摄影”，却很少有人提到它，也不见于文字记载。这张照片，对于了解文学研究会成立，是很有价值的。不知道当时洗印了多少，笔者却有幸见到了一张，这里愿意作个简略介绍。

照片原大八吋，后边有硬纸托，右下角有“同生 北京廊房头条”字样，说明了照像馆的字号和地址。这张照片，原来保存在瞿世英先生手中。瞿先生是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个发起人之一，他的入会号数正好是十二。瞿先生解放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在一九六一年十月，他把这张珍藏了四十年的照片，赠给了师大中文系。

这张照片的可珍贵处，还在于上边有郑振铎先生的亲笔题字，并注出了照片上每个人的名字，这使它具有了文献价值。右边纸托上，写着“文学研究会成立会摄影 一九二一、一、四、于：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字样，说明照片的纪念意义。左边纸托上，则是“×××惠存 弟郑振铎赠”数字。受片人是谁，已被挖掉了。据瞿世英先生赠照片时说，“此片系郑振铎先生所赠，受片人的名字

^① “文学研究会成立会摄影”的照片刊《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封二，原件现藏中国现代文学馆。

忘记了因为什么被挖掉。”在纸托的上下，有三行人名，是注明了照相人的姓名的。从右至左，前排是：易家钺、瞿世英、王统照、黄英、杨伟业、郭梦良；中排是：蒋百里、朱希祖、范用余、许光迪、白镛、江小鹈；后排是：孙伏园、耿济之、苏宗武、李晋、许地山、宋介、郑振铎、王星汉。郑振铎在自己的名字上，作了个“×”的记号，同时在自己照相的胸前，也用墨笔作了个“×”的记号，这是要告诉受片人，照片中那个是他。这代表了郑振铎那做事一丝不苟的作风，同时说明被挖掉的受片人姓名不是瞿世英，因为瞿与郑很熟，并一起参加了摄影，那是用不着提示的。

这张照片上共有二十人，而“纪事”却说“到会者二十一人”。这里差了一人，不知为什么？是有一人因故没有参加照相，还是有一个“到会者”不是会员呢？有待进一步查考。

在《新文学史料》第三辑（一九七九年五月）上，刊出了一份“文学研究会会员录”，这对了解文学研究会这个社团，无疑是极有用处的。但可惜它不是全部，按入会号数查对，中间有缺额。我们用这份名单与出席成立会并参加摄影的人相较，就会发现有十人不见于“会员录”，这是：杨伟业、郭梦良、范用余、许光迪、白镛、江小鹈、苏宗武、李晋、宋介、王星汉。这十人，恐怕不仅是会员，而且是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被通过入会的会员。在入会号数三十六之前，还有不少空额，照常理推想，这十个人能在那里找到位置。但是，文学研究会的人会比较严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入会号数，所以在找到确切的证据前，我们不能说出这十个人的具体情况。从他们当时在北京，参加了来今雨轩的成立大会来看，他们的入会号数应当是在前边的。因为我们看到了这张照片，看到了郑振铎亲笔注明的他们的姓名，现在来推论这个问题，还是有说服力的。按“文学研究会读书会”的规定，“凡文学研究会会员均须入本会为会员”，那么这参加成立会的二十人，无疑问都应当是读书会会员。但一九二一年六月公布的读书会会员

名单中，却不见郭梦良、江小鹈、宋介、苏宗武的名字，如果宋锡珠就是宋介、苏驭群就是苏宗武，那还差了两个人，就不知是因为什么了。这要待了解文坛史料的同志们教正。

（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一篇鲁迅佚文的题目

二十多年前，我在翻阅旧杂志的时候，发现了一篇鲁迅佚文的题目。这篇佚文，我虽然寻找了很久，但仍没有结果；今天能提供出来的，还只是一个题目。

在《新潮》(北大新潮社编)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月1日出版)和第二号(1919年2月1日出版)上，登载着《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三号的“要目预告”。这里预告了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的题目：

“破坏与建设是一不是二”？(唐俟)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三号正式出版了，里边却没有这篇文章。该期杂志上，有两则鲁迅先生的“随感录”，即署名鲁迅的“五三”和署名唐俟的“五四”。这两篇随感后来都收在了《热风》中，细读全文，都不能与《“破坏与建设是一不是二”？》这个题目相切合，证明它们不是去掉了标题用“随感录”的编号发表了的。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哪里去了？当时发表了没有？这个问题我很关心，有好几年我都在寻找它；但是，一点消息也没有。一九七二年五月，《文物》(革命文物特刊之一)出版了，上边有一则没有发表过的“随感录”的手迹。当时我大喜过望，以为遗失多年的那一篇佚文出现了。但细读手迹内容，似乎不大像；加以发表的手迹，只是全文的一部分，更难判断它与那个题目是否切合了。六月的某一天下午，在琉璃厂中国书店遇见了唐弢先生，他是精于鲁迅著作辑佚和考订的专家，我便当面请教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不久，唐弢先生来了信，回答了我的问题，并对这篇佚文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现在，我极冒昧地摘引出原信的一段来：

《新潮》上的广告我已查过，《文物》上登的那一篇，无论从内容和手稿形式来看，都不是《“破坏与建设是一不是二”？》……现在就留下《“破坏与建设是一不是二”？》的问题了，原语有引号，可见是别人说过的话，又加问号，说明鲁迅不大同意这个意见，是篇驳难文章。如果发表了的话，不难找出问题的原委和文章的出处，只怕也像那篇随感录那样，被编者压下，难免成为“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另一例。不过对方的文章一定是发表了，要弄清楚原委或者还不难，同时鲁迅的文章也一定是写好了的，按照他的习惯，如果没有杀青，决不会让刊物登出预告。

唐先生的分析，又具体，又细致，很有说服力。又是好几年过去了，这篇鲁迅佚文依然没有被发现出来，我们所知道的还是一个题目：《“破坏与建设是一不是二”？》。现在，我把这个题目及有关线索提供出来，请留心此道的同行们注意，并求教于研究鲁迅的专家们。如果能因此而使这篇鲁迅佚文被发现，那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了！

（载《鲁迅学刊》第2期，1981年7月出版）